

台湾作家小说选集

张葆莘 编

上卷

22461

台湾作家小说选集

—

60740

张 萍 莹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台湾作家小说选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25印张 4插页 501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6,001—68,500册
统一书号：10190·075 定价：2.40元

编者的话

《台湾作家小说选集》选收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八一年，凡五十五年间有代表性的台湾作家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力求较系统地体现出台湾地区我国中短篇小说创作和发展的概貌。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为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作家的作品；第二辑为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作家的作品；第三辑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作家的作品；第四辑为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作家的作品。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曾蒙台湾一些作家朋友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有的对选目反复提出增删意见，有的连续多次地选寄作品或惠赠大批有关书籍；有的热情寄来有关他们生平、创作和评论的资料，有的亲自审订本书对他（她）们的介绍文字；为了搜寻一篇在台北也不易找到的小说，一位尚未谋面朋友甚至专程跑到台湾中部去代为复印，……。由于台湾和祖国大陆暂时还处于隔绝状态，在搜集作家和作品资料上还有着很大的困难，再加上自己的水平有限，见闻不广，如果不是这些热心的朋友给予种种帮助，这部选集是不会以现在这个样子很快与读者见面的。

遗憾的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不便将这些相识或

不相识的朋友的名字一一列出向他(她)们致谢。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本选集所选的作家及其作品，也不便一一去征求意见。我想他(她)们都是会谅解的。待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统一大业完成之日，当向他(她)们面致谢忱和歉意。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的。

本选集肯定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足或不妥之处，诚恳地期望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张 蔡 莘

一九八一年八月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次

前 言	张葆莘(1)
赖 和		
一杆“称仔”	(29)
不如意的过年	(39)
可怜她死了	(46)
杨云萍		
光 临	(62)
黄昏的蔗园	(66)
张我军		
买彩票	(74)
陈虚谷		
他发财了	(85)
无处申冤	(99)
荣 归	(116)
杨守愚		
过 年	(129)

鸳 鸯(168)
芥 舟	
鬼(160)
蔡愁洞	
保正伯(186)
朱点人	
岛 都(195)
脱 颖(209)
张深切	
鸭 母(230)
王锦江	
夜 雨(249)
绘 声	
秋 儿(258)
杨 华	
一个劳动者的死(266)
薄 命(277)
林越峰	
红萝卜(287)
马木枥	
西北雨(293)
赖贤颖	
稻热病(310)

康道乐

失业.....(339)

黄有才

凄惨谱.....(360)

杨达

水牛.....(367)

送报夫.....(373)

春光关不住.....(409)

张文环

艺旦之家.....(418)

阉鸡.....(460)

吕赫若

庙庭.....(505)

月夜.....(522)

吴浊流

水月.....(545)

先生妈.....(551)

陈大人.....(565)

波茨坦科长.....(591)

龙瑛宗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657)

黄昏月.....(708)

叶石涛

狱中记.....(730)

钟理和

苍 蝇 (774)

贫贱夫妻 (779)

张彦勋

捕蛙父子 (793)

前　　言

张葆莘

一

台湾文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台湾省的中国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台湾省的新文学运动，是在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直接影响，并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而暂时与祖国大陆隔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

自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被迫将台湾割给日本时起，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从未间断过，他们进行过武装斗争，也进行过非武装斗争。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既是台湾人民进行非武装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

中国新文化运动曾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而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下的台湾省，在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爱国的、进步的台湾知识分子，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也创办了一份《新青年》式的刊物——《台湾青年》（一九二二年改题为《台湾》，一九二三年增办《台湾民报》，一九三〇年又改称为《台湾新民报》）。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和

这家刊物是分不开的。

《台湾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与职务》(陈忻)的文章。文章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负有传播文明思想、改造社会之使命；近来在中国大陆所提倡的白话文学便是这种文学。因此，作者呼吁：“有光彩的历史的台湾文坛，也应朝此一方向去努力。”接着，《台湾青年》在第三卷第三期又刊登了一篇《实社会与文学》(甘文芳)，向台湾同胞介绍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战后中华的文学已渐渐被介绍于欧美，而且又有以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开展中，这实在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迫切的时势的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重围下，已不需要那种有闲文学——风流韵事、茶余酒后的玩弄物了。”同卷第六期的《日用文鼓吹论》(陈端明)一文更明确指出：“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之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字，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因该期被禁，此文又重刊于第四卷第一期)。

一九二三年一月号的《台湾》杂志发表了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二月号又发表了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黄呈聪在文章一开头就说他是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亲眼看到白话文普及的情况，才更加确实感觉到普及白话文的必要的；黄朝琴则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普及了白话文，而台湾“一般的读书人，仍然照着八股做法来教后辈，所以到如今，全岛新闻杂志、社会应酬，无不仍用这种言文不一的汉文，你看象本家的中国，尚且知道改用白话文，区区的台湾，仍然守着

它，岂不是做个汉文的守旧派吗？”正是在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的影响下，也是当时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迫，台湾新文学运动也从普及白话文开始揭开了序幕。

为了大力提倡和推广白话文，《台湾》杂志增办了一份全部用白话文的《台湾民报》（该报创刊后还创设了“白话文研究会”），版面上辟有关于白话文的“应接室”专栏，由超今（黄朝琴）主持。《台湾民报》先是半月刊，后又改为旬刊、周刊，它虽然是个综合性的刊物，但每期都设有“文艺”专栏，刊登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给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阵地。直到一九三二年，台湾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台湾民报》（后来改为《台湾新民报》）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摇篮，它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台湾民报》是在一九二三年创刊的。这时，祖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团体已先后建立，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等新文学重要作品均已出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下而倡导白话文的《台湾民报》，当然不会不注意到祖国大陆文坛的动向，便在第一卷第四期刊登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作者许乃昌（署名秀湖）是当时在上海读书的台湾籍学生。这是一篇最早向台湾同胞较全面地介绍祖国大陆新文学及其成就的文章，字里行间也暗示了台湾的文学也该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接着，《台湾民报》又连续发表了苏维霖（梦雨）的《二十年来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

述》（第二卷第十期）、张我军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来》（第三卷第六、七、八期）等。与此同时，《台湾民报》还刊登了不少祖国大陆新文学作品以及外国文学作品。

所有这些，就是不久蓬勃发展起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前奏。

台湾的新旧文学的论争，发生在一九二四年。首先向台湾的旧文学进行抨击的是当时正在北京读书的张我军。他在北京亲身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台湾社会的现状，便写了一篇《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射出了第一枪，刊登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台湾民报》（第二卷第七期）上。随后，他又赶回台湾，参加《台湾民报》工作，担任该刊编辑，更直接地投身于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痛感着台湾的文学之道已污秽不堪极了，已有从根本上扫除刷清的必要了！可是我已候之久了，却候不出一个人肯来当这个扫除刷清的职务。我于是顾不得力微，便拿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出来，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当年十一月，他用“一郎”的笔名，在《台湾民报》上又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在这篇向旧文学宣战的檄文里，张我军揭露当时台湾旧诗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诗，只是利用旧诗向日本总督讨好而把旧诗做为“沽名钓誉”的工具，并指出这种灭病呻吟的旧诗只能毒害青年，使之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这是张我军向台湾旧诗坛投去的第一颗炮弹。

台湾的旧文学阵营当然不会保持沉默。当时台湾旧诗坛

的代表人物连雅堂在他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对张我军进行了反击，说他“提倡新文学”，是“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丐其一滴沾沾自喜，诚陷阱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张我军又连续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他还在《台湾民报》上写了一系列的《随感录》。旧文学阵营方面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好向张我军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张我军最后发表声明：“新旧文学之是非已甚明了，我们之后当向建设方面努力，无价值的对骂，是无用的努力，故如再骂我的臭文字，我是不去理会他了。”

于是，张我军转向新文学的建设，先后又发表了《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诗体的解放》等。做为《台湾民报》的编辑，他在版面上还大力介绍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佳作，从而鼓励了台湾新文学的创作。他先后刊载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江湾即景》、《赠友》，冰心的《超人》，西谛的《墙角的创痕》、淦女士的《隔绝》，徐去摩的《自剖》……等。刊登这些作品时，张我军还撰写了作者的简介附在后面，帮助读者了解，加深印象，这些介绍，使台湾文坛直接受到了祖国大陆新文学的滋养。

《台湾民报》最早发表的台湾新文学作品是新诗。一九二四年曾先后发表了施文杞的《假面具》、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张我军的《无情的雨》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出版了张我军的新诗集《乱都之恋》，这是台湾的第一部新诗集。一九

二六年新年号的《台湾民报》发表了赖和的《斗闹热》、杨云萍的《光临》，稍后又发表了张我军的《买彩票》，这是台湾文坛最早出现的小说。

二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史，每一页都充满着血和泪。在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赖和、杨云萍、陈虚谷、杨守愚、芥舟、蔡愁洞、朱点人、张深切、王锦江、绘声、杨华、林越峰、马木枥、赖贤颖、康道乐、黄有才、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张文环、吴浊流……等台湾作家，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了许多反映台湾同胞的苦难生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的优秀作品。正如一位台湾评论家所说，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的“台湾作家的作品里，是充满着社会意识的，很少逃避现实、遁入虚妄的王国里。大多数的作品，所描写的是穷苦、朴实的农民，和他们在剥削下的生活，或者日本警察的暴虐嘴脸，御用绅士、走狗的面目等等殖民地现象。大多数的作家都能将自我的价值归结到社会大众上，社会的灾难就是个人的灾难，周围人民的不幸就是个人的不幸，借着作品表达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抗议精神，或是对不可抗拒之外加灾祸的刚毅的隐忍精神。”^①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时期，台湾同胞直接受到的政治压迫

^①见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台北《中外文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号。

是来自殖民者的统治工具——警察。在台湾具体实施日本的殖民统治的警察，除做为统治者的鹰犬外，还兼有辅助行政的职能，每一个警察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都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权。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和统治台湾的最初几年，警察（“巡查”）全由日本人担任，台湾同胞讽刺地称之为“查大人”；一八九九年以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又酌用台湾人充当“巡查补”，台湾同胞蔑称之为“补大人”。日本殖民者正是通过巡查和巡查补组成了一个严密而又残酷的警察网，统治着全台湾的中国人民。本辑选收的赖和的《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陈虚谷的《他发财了》、《无处申冤》，吴浊流的《陈大人》等作品中，那些专制、残暴的警察，都是做为日本殖民者（及其走狗）的形象出现的。在沦为殖民地的那个世纪里，台湾是一个强权主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异族统治者——包括他们的爪牙和走狗，都是十足的残暴不仁的。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一再重复这个题材；即使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以后，揭露警察的凶残的作品，仍不断出现（一九四〇年出生的杨青矗也还写过这样题材的小说《冤家》）。可见那些助纣为虐的“查大人”和“补大人”当时的罪恶之重，台湾同胞对他们的痛恨之深。

那一时期的台湾小说，还有一些是直接控诉殖民者利用政治特权对台湾同胞进行经济压榨的。富饶的祖国宝岛台湾盛产甘蔗。日本殖民者通过制糖公司对台湾蔗农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一九二五年三月出刊的《台湾民报》第三卷第八期有篇题为《台湾青年的使命》的文章，曾经指出：“殖民地的

统治方针，其根本目的是在经济的榨取，政治的差别不过是要达其目的的手段而已。……如对（日本）制糖会社的保护奖励，单晓得会社利益，一年几千万纯利，岂不是本岛农民汗血的结晶么？然本岛农民所得若何？一年中的辛苦，所得不过维持最下等的生活而已，你想惨不惨呢？”本辑中的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杨守愚的《鸳鸯》、杨逵的《送报夫》等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形象地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利用政治特权对蔗农进行野蛮的政治迫害和残酷的经济剥削。《黄昏的蔗园》里的蔗农文能，不愿永远做牛做马，反抗日本制糖公司而被警方捕去。作者虽然没有正面写他如何“反抗”和“闹事”，只是写他被捕的十五天后，他的年轻的妻子回忆他们在劳动中的“一时的青春”，现实和回忆的几个交错的小镜头，就展现了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悲惨生活。《鸳鸯》里的阿荣是一家日本制糖公司农场的工人，在搬运甘蔗时被蔗车轧断了左脚，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生活窘迫，无奈只好叫妻子鸳鸯去农场给日本监督（工头）做饭。鸳鸯却被禽兽般的日本监督所玷污，不得不含辱自杀。

《送报夫》的主人公也是被一家日本制糖公司在台湾强行吞并土地，逼得家败人亡的。他家原是有两甲水田和五甲园田的自耕农。日本制糖公司为了强行征购这个村子的耕地，利用政治上的特权，会同警察局将村民召集到妈祖庙进行威胁，声称谁不卖地，谁便是有“阴谋”的“非（日本）国民”。由于主人公的父亲表示不愿卖，便被捉到警察分所，拘留了五天，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这位农民不仅土地被强行“买”